



崛起的征程——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共产党

巨龙腾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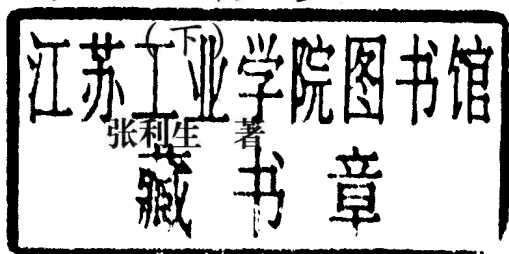
(下)

张利生/著

辽海出版社

崛起的征程
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国共产党

巨龙腾空



辽海出版社

四 稳定周边

1954年6月28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共同倡导了著名的五项原则（印度人称为潘查希拉）。这些原则是：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四十多年来，这些原则已逐步被国际社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广泛接受，作为指导国家关系的准则，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在当今新的国际形势下，在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四十多年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运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 南亚邻邦

进入80年代以来，尤其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国同南亚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全面发展时期。尤其是中印关系明显改善。

1982年10月22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说：“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

个边界问题。双方都应该做些事情来恢复 50 年代的友谊。”

1987 年，印度总理拉·甘地在对华政策上进行了调整，并于 1988 年 9 月对中国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从此，中印关系日益改善。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印之间发生了边界战争，两国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倒退。70 年代中期以后，中印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两国关系开始解冻。后来开始的副外长级官员会谈，又使两国关系进一步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

80 年代后半期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以对抗和紧张为特征的两极格局已经完结。冷战的结束使世界战略态势发生了影响深远的变化，特别是大国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为中印关系的改善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以及中俄关系的进展，曾经对中印关系产生过较大影响的外部因素已经消失或者开始弱化。

另外，冷战结束以后，中印两国增强自身国力、努力发展本国经济的主观意愿更加明确。拉·甘地执政时就提出“消灭贫穷、改变经济落后面貌，争取在 21 世纪建立一个强大的新印度”口号。拉奥执政以后，明确地实施经济改革，实行经济自由化。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更是明确地将国家的中心任务转到加快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因此，争取和平安宁的周边环境，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基本方针。同印度发展睦邻友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重要考虑之一。还有，中印在建立冷战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过程中加强合作的共识增强。中国和印度作为有一定影响力的发展中的大国应该加强合作，为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繁荣和发展共同努力，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利益。

1991年12月，李鹏总理应邀访印。双方声明，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不针对任何第三国。双方还同意将两国边防人员的不定期会晤改为定期会晤。印方重申印度政府对西藏问题的长期和一贯政策，即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印方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进行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在孟买和上海恢复设立总领事馆的协议》、《领事条约》、《关于恢复边境贸易议定书》和《中国航天工业部和印度航天部关于利用外空科技合作谅解备忘录》。

中印两国关系的改善，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具有很多有利条件和可靠的基础。在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双边关系不断取得进展。

从政治方面来看。继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和中国总理李鹏实现互访之后，印度总理拉奥于1993年9月对中国进行了成功的访问。这是两国关系史上重要的一章，对于推动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拉奥访华期间，中印两国正式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以及其他三份文件。这三份文件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与印度新闻广播部广播电视合作协议》、《中印两国政府环境合作协定》、《中印两国政府关于在什布奇拉山口两侧扩大边境贸易的协议书》。

《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规定，中印边界问题应该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双方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两国解决边界问题之前，彼此严格尊重和遵守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双方将把实际控制线地区各自的军事力量保持在最低水平，以便与两国日益发展的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这一协定，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印关系的气氛，为最终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事实上，两

国在边界地区正在采取建立信任措施。尽管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磋商，但无疑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

此后，中印两国之间的高层互访相当频繁。印度总统、副总统，中国政协主席李瑞环、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等都分别访问过印度。部长级的代表团更是往来不断。1995年8月，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在新德里举行第八轮会谈，双方就有关问题达成如下一致意见：撤除旺东地区的4个哨所，避免军队之间的近距离对峙；就实际控制线走向有不同认识的地区的名单达成一致意见，同意通过磋商，逐一解决分歧；加强边防当局和军事机构之间的往来，在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

从经济贸易来看，中国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就把国家战略的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印度自80年代末以来，也把国家战略的中心放在振兴经济上。中国的人口已经超过12亿，印度人口超过9亿，二者加起来已经达至20亿多。改变各自的贫困面貌是两个国家的共同心愿。加强经济合作和贸易往来，是两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中印两国的经济规模都十分庞大，经济贸易具有一定的互补性。中印之间扩大贸易的潜力很大。近年来，中印贸易迅速增长，贸易额成倍增加，边境贸易也有很大发展。但是，同中印两国的经济规模相比，比重仍是微不足道的。1995年，中国的外贸总额为2800亿美元，中印贸易所占的比重不超过0.2%。从印度来看，印中贸易仅占它外贸总额的2%左右。目前，双方都在努力发掘对方的市场，争取加快贸易的迅速增长。

印度和平利用原子能的技术、农业技术、遗传工程、计算机特别是在软件开发方面的技术，已经引起中国方面的注意。中国的小高炉技术、小水电技术、空间技术也引起了印度方面

的兴趣。双方在这些方面取长补短，互相合作，可以加速各自的经济的发展，减少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有助于促进两国关系更加成熟，更为牢固。目前，两国在农业、生物工程、冶金等方面的合作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印度斯坦航空工业有限公司已经与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签订协议，与韩国一家公司一道开发生产“亚洲快车”民用客机。几个投资数额较大的合资企业也已开始投入运营，表明中印经济技术合作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建立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南北关系、人权、环境保护等问题上，中国和印度有很多共同语言。中国和印度都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反对由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主宰世界并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中国和印度都认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应以它来作为建立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在人权问题上，两国都认为发展权是人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人权在法律上来说属于一国主权之内的事情；双方都抵制少数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的行径，不赞成某些西方国家以减少援助为手段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的作法；中印两国已经开始在讨论人权的国际论坛上协商合作，并多次挫败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干涉别国内政的企图。

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原因，进一步发展中印关系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障碍。

从印度方面来看，它对中国还存在一些疑虑。其疑虑之一是，认为中国的强大和崛起可能影响印度的国家安全。某些印度人认为，虽然近年来印中之间的外交和文化交流不断增加，但是决不能轻视来自中国的“潜在威胁”，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对印度的国家安全构成的严重挑战。

印度大力发展核武器，拒绝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上签

字。

1998年5月11日和13日，印度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先后进行了5次核试验。在此之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多次散布“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为其进行核试验找借口。

1998年5月23日发自新德里的一条消息，题为《印国防部长仍然强调“中国威胁论”》，摘要如下：

印度国防部长22日单独会见了一名记者。在谈到印度不久前进行的核试验时，他说，这是基于瓦杰帕伊政府优先考虑“国家安全”的想法，并表明了“中国是最大的威胁”的观点。费尔南德斯对日本政府冻结开发援助等对印度的经济援助项目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说：“我们不会屈服于压力。”

费尔南德斯认为，国际社会应该承认印度已成为世界上第六个“核拥有国”，他表示：“印度有意作为核拥有国参加一揽子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他表明了印度准备从占有特权地位的核拥有国的立场出发，要求修改防止核扩散条约的打算。

此外，费尔南德斯认为，在现有的防止核扩散条约体制下，“国家安全存在危险”，并指出“国家安全是现政府最优先考虑的课题”。谈到具体的“危险”时，他说：“虽然不能说中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但它是我们最大的威胁。”

关于中国是最大威胁的具体根据，费尔南德斯指出，中国在缅甸和西藏部署的核导弹是以印度为目标的。

最近，印度对待中国的态度和进行针对中国的核试验，给本已取得良好发展的中印关系蒙上了阴影，也挑起了南亚地区核竞赛。

继印度核试验后，作为回应，巴基斯坦于5月28日也进行了5次核试验。印巴的核试验，在南亚地区形成核竞赛，造

成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

对于中印关系，中国的国家战略现在是比较清楚的，即在中印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各国发展友好关系。印度是中国的近邻，在国际事务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中印关系的性质应该是地缘政治上的好邻居，区域合作的好朋友，国际事务中的好伙伴。早在1982年，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指出，“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我们希望自己发达，也希望你们发达”，“中印都强大起来，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将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是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在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候，就明确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地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中国不折不扣地坚定地信守诺言，并一直致力于推动全面彻底销毁核武器。一旦国际社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的条约，中国将认真执行这一条约。

印度对中国的另一个疑虑是，担心中国与巴基斯坦发展关系会影响印中关系。毋庸讳言，由于中巴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国际问题上进行过长期有效的合作，双方的友好关系不断发展。中国高度重视巴基斯坦这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同时也高度重视同印度的关系。从近年来中国对印度的态度上可以看出这一点。中国真诚希望中印、中巴以及印巴关系呈现良性循环地同步发展，真诚希望印巴之间谈判协商解决双边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改变在克什米尔地区存在的低烈度战争的态势，逐步缓和紧张状况。中国尤其不希望印巴之间在核扩散问题上造成紧张关系的升级。

从中国方面来看，边界问题尚未最终解决，是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因为边界问题涉及我国的根本利益，又直接涉及到人民的民族感情，所以只能在条件成熟时，由两

国领导人做出政治决断。

另外，中国还关注流亡的西藏人在印度所进行的分裂活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西藏的稳定，又关系到我国西南部的安全。中国政府赞赏印度政府所宣布的立场，即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印度政府不允许西藏人在印度领土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政治活动。但是，在印度仍有一些人对达赖集团分裂中国的行径给予支持，企图使西藏成为印中的一个缓冲区，或者使这个问题成为向中国施加压力和影响的筹码。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密切关注。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关系的发展，对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来说，中印关系的发展，直接关系到我国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安全，也关系到中国整个外交工作的战略部署，因此有必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加以深入的研究。

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的邻邦，两国之间的友谊具有深厚的历史根基。巴基斯坦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早在1951年5月21日，中巴两国就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此后，双方来往十分密切，合作非常真诚。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中巴两国的合作十分默契，配合非常得力。这种合作堪称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合作的典范。

中巴友好关系具有深厚的基础。

首先，中巴两国人民的友谊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凡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巴基斯坦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近代历史上，中巴都曾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具有共同的历史命运。这种共同性使得彼此能够深刻理解对方的想法和要求，产生互相支持和帮助的心理动机。

另外，中巴两国的关系具有共同的战略考虑。这就是反对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70年代末期以来，中巴两国都坚决反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并对阿富汗人民反侵略的斗争给予了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极大支持。每当在巴基斯坦遇到困难的时候，中国总是给予有力的支持，而在许多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巴基斯坦总是对中国的立场表示支持。在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问题上，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挫败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干涉中国内政的问题上，巴基斯坦都完全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行事。特别在中美建交的问题上，巴基斯坦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周密的安排，起到了其他国家难以替代的作用，成为中美沟通的桥梁。

其次，发展中巴关系是两国政府的共同愿望。1963年，中巴两国政府通过友好协商，较好地解决了边界问题。两国之间的高层交往十分频繁。巴基斯坦的总统、总理都曾多次访问中国，中国的总理也曾访问巴基斯坦，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周总理曾5次访问巴基斯坦，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两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也是比较密切的。巴基斯坦将对华关系视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石，中国对中巴关系也给予高度重视。

巴基斯坦是中国在南亚的亲密友好邻邦，两国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始终能够相互谅解，相互支持，两国高层互访不断，两国在军工、军贸领域的合作一直持续发展，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也迅速发展，中国公司与巴方签订了上百个合同。

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对南亚国家的政策做了某些调整。但是，中国同巴基斯坦的关系仍将继续发展。

首先，两国间良好的政治关系将继续保持。冷战以后，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世界上原有的两极对抗局面已不复存在，在南亚地区以印苏为一方、美巴为另一方的“双打

对抗”态势已发生质变，中国同印度的关系已经大大改善，但中巴之间的友好往来仍将发展，国际合作仍将会保持。

其次，两国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将进一步加强。中巴经济贸易关系有一定的互补性，发展经济贸易合作具有不小的潜力。巴基斯坦希望中国增加从巴基斯坦的进口，改变长期以来中方顺差的局面，中国方面也正在做出努力，采取积极态度解决双边贸易中存在的问题。现在，中巴双方正在工程承包和建立合资企业方面进行协商，争取取得较大进展。

中国同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一般说来都是比较好的或相当好的。彼此之间在长期的交往中，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和良好的关系。

尼泊尔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1955年8月，中国同尼泊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次年9月，两国签订友好和贸易交通协定。由于尼泊尔是处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小国，被人喻为“夹在两块石头缝中的番薯”，因此它同周边邻国都保持较好的关系。中国对它也给予了无私的援助，帮助尼泊尔修建了公路等工程项目。尼泊尔对流亡的西藏人有一定约束，不允许他们从事反对中国的政治活动。

孟加拉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不过二十多年的历史。自它成立以来，一直坚持不结盟政策，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影响。1975年，中孟建立外交关系。此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孟加拉国在国际事务中，多支持中国立场，同情中国主张。中国对孟加拉国在国际社会中坚持独立自主、主持正义的做法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经济技术方面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援助，两国在工程承包方面的合作取得很大的成功。

斯里兰卡是最早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中斯建交以来，两国人民不断谱写友谊的篇章。在朝鲜战争期间，斯里兰卡就冲破美国的大力阻挠，同中国签订了用橡胶交换大米的协定。70年代以后，斯里兰卡领导人访问中国，为加强中斯关系做出积极努力，受到中方的热烈欢迎。中国领导人也数次访问斯里兰卡，有力地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

此外，尽管中国同不丹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但不丹的外交大臣曾访问我国，就两国之间存在的边界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磋商，双方本着友好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基本达成一些谅解。中国总理和外长分别会见了。两国领导人还在对方国庆时互致祝贺。中国同马尔代夫的关系也在发展中。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曾对马尔代夫进行过正式友好访问。

2 大东盟

东盟的全称是“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于1967年8月，成员国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菲律宾、文莱和越南。根据1995年的最新计划，东盟将在2000年之前吸收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等3个国家，发展成为囊括整个东南亚地区、拥有10个国家、448万平方公里土地和4.5亿人口的区域性组织。东盟组织的新旧成员国都是中国的南方近邻，与中国的关系源远流长。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涉及政治、安全、社会、经济、文化与科技等各个方面，其速度之快和领域之广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与东盟未来关系的发展潜力仍相当之大，有待于双方更进一步的共同努力。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关系在50~80年代经历了相当曲

折的发展过程，其主要原因是冷战时期双方的政治对峙、意识形态差异、华人华侨问题以及政策方面的种种变化。随着 70 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及 1975 年越战结束，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1978 年以后，中国与东盟开始进行相当密切的外交合作，共同促成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在柬埔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中国与东盟逐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政治合作关系。中国与印尼早在 1950 年 6 月就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55 年 4 月周恩来总理赴万隆参加亚非会议，1956 年 9 月苏加诺总统访问北京，1961 年 3 月陈毅外长出访雅加达，1961 年 6 月苏加诺再次访问北京以及 1964 年 4 月刘少奇主席访问印尼，都曾使两国关系不断升温。但是 1965 年“九·三〇事件”后两国关系严重倒退。1967 年 10 月，印尼政府关闭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两国从此断绝一切关系。

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在 70 年代中期以前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抱有恐惧心理，对中国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导致双方关系的疏远与隔绝，并在越美战争期间发展为相互敌视与对抗。随着 1972 年中美和解，马、泰、菲三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对华政策。1974 年，马来西亚率先与中国建交；1975 年，泰、菲两国也与中国建交。80 年代中期以后，三国与中国的关系开始全面发展。马来西亚于 1985 年放宽对本国公民赴华经商的限制；1988 年废除“中国商品进口许可证”制度，1989 年在吉隆坡与广州之间开通航班。泰国在 1985 年与中国签署《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并建立经济合作委员会，双边关系被邓小平高度评价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友好合作的典范”。1988 年，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夫人以亲戚加元首的双重身份访华寻根，将菲中关系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是最早承认越南新政权的国家，早在 1950 年 1 月 18

日就与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在 70 年代中期以前，对于越南驱逐殖民势力的抗法战争和实现祖国统一的抗美战争，中国都从物质和道义两个方面给予无私的援助，中越关系发展为“同志加兄弟”的亲密关系。但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胜利以后，中越之间发生了不愉快的事。

此外，中国与老挝的关系原来相当密切，70 年代中期以后中老关系由热转冷。中国与柬埔寨在 1958 年建交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在柬埔寨发生军事政变以后，中国始终支持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中国与缅甸在 1950 年建交后的关系基本正常，但在 60 年代中期也曾一度中断。中国与文莱和新加坡在 90 年代之前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在 1975 年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首次访华以后，中新两国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就已发展起来。

进入 90 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冷战的结束，东南亚地区两极对抗的消失以及中国改革开放的持续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尤其是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1990 年 8 月 8 日，中国与印尼恢复外交关系。1990 年 10 月 3 日，中国与新加坡正式建立外交关系。1991 年 9 月 30 日，中国与文莱建立外交关系。1991 年 11 月，中越关系正常化。从此，中国与东南亚 10 个国家全都建立或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

1990 年 8 月和 10 月中国与印尼、新加坡分别恢复和建立外交关系以后，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在此基础上，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双边关系也得到迅速发展。1991 年 5 月底，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致函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巴达维，正式表示中国希望成为东盟的对话国。1991 年 7 月，当中国作为东道国的贵宾首次参加东盟外长会议时，钱其琛表示：“中国愿同东盟进一步加强合作，在政治、经济、科

技和安全等方面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

9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组织的双边合作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在地区安全方面。表现为中国参加东盟外长会议的身份不断提升；共同促进柬埔寨问题的全面政治解决；并于1994年以后作为正式成员积极支持和参与东盟地区论坛。1990年12月，当中国总理李鹏在一年之内第二次访问东南亚国家时，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欢迎宴会上说：“目前，东盟共与6个国家有对话关系，虽然中国不是其中的一个对话国，但作为一个具有经济潜力的大国，而且又是亚太地区的国家之一，中国最终是有可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的。”东盟各国对此表示了欢迎的态度。

1991年6月，泰国总理阿南·班雅拉春在欢迎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的招待会上就认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这一新进展是值得欢迎的。

1991年7月19日~20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应东盟常务委员会轮值主席马来西亚外交部长巴达维的邀请，出席了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二十四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并与东盟6国外交部长就本地区的形势、合作以及中国同东盟进一步发展友好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这是中国首次同东盟组织进行正式接触，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对话的开始。在会晤中，钱其琛重申了中国希望同东盟建立政治安全对话关系的愿望，并表示“为维护本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愿同东盟进行磋商和对话，我们愿意听取东盟一切有利于改善和平环境的主张和建议。”“尊重并支持东盟关于建立东南亚和平、自由、中立和无核区的主张。”在以后的历次东盟外长会议上，中国也都表示了相同的看法。

从1991—1994年，中国外交部长每年都应东道国的邀请

出席东盟外长会议，并与东盟各国外交部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磋商。

1992年，中国还建议“建立一个中国与东盟就影响地区安全的问题进行磋商的机构”。

1995年，中国成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国。随着中国与东盟双边关系的不断加深，中国升格为东盟全面对话伙伴国的时机也日渐成熟。

1996年3月，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致函东盟常务委员会轮值主席、印尼外交部长阿拉塔斯，明确表示中国希望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东盟各国对此作出积极反应。同年6月，印尼外交部长代表东盟各国外交部长致函钱其琛，表示东盟外长一致同意将东盟和中国的磋商伙伴关系升格为全面对话伙伴关系。

6月21日发表的第二十九届东盟外长会议联合公报对中国成为东盟的对话伙伴表示欢迎，并希望扩大东盟与中国之间的合作。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及东盟组织的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作为东盟的磋商伙伴国，是东盟的客人，只能在每届外长会议开幕式上发表演说；作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就可以在外长会议后参加外长扩大会议，并与东盟就广泛问题进行实质性磋商。

中国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后，双方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合作必然会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不仅符合中国和东盟各国人民的利益，促进双方经济发展，而且也有利于东南亚和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发展。

1997年2月，中国与东盟又在北京成立中国东盟联合合作委员会并举行了首次会议。该委员会的成立，是中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国的重要后续行动，为中国与东盟的双边合作又开